

文史资料选辑

合 订 本

第 10 卷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文史资料选辑

合订本

第 10 卷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开明旧事——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	宋云彬(1)
留英记	费孝通(27)
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	潘光旦(58)
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	林砺儒(95)
沪江大学始末简记	刘王立明(105)
记北平新学联	中大荣(119)
解放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	关瑞梧(136)
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沿革	朱锡祚(146)
从成都商业银行看解放前金融业的畸形异象	米庆云(164)
大成纺织染公司与刘国钧	朱希武(185)
国货售品所始末	纪 华(195)
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	任启圣(209)
康南海史料商榷	王益知(218)
记北京饭店	邵宝元(228)
北京电车公司见闻回忆	刘一峰(234)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阅读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的管见(校订和补充)	徐一士(257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关于《中村事件真相》的补充·····	谷振寰(264)
关于章嘉代表少数民族的问题·····	郭清德(265)
对《虞洽卿的一生》的补正·····	赵晋卿(265)
对《选辑》第十七辑、二十辑中三文的几点补正 ·····	范予遂(268)
有关黄百韬史料的补正·····	岳星明(269)
对《解放前夕我和胡宗南策划的一个阴谋》 的两点订正·····	张宣武(271)
有关段英被杀的一点史实·····	永莲香(271)
关于“广德、泗安的防御战”的再加订正和补充 ·····	张宣武(272)
萧忠贞不是改组派北平负责人·····	萧 训(276)
对《选辑》二十四辑三篇的补充和订正·····	黎照寰(276)
对《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》的订正和补充·····	任启圣(279)
对《护法军政府海军始末》的几点意见·····	陈文会(281)
关于周学熙、杨味云和华新纱厂资料的补充 ·····	夏少泉(282)
对《选辑》二十四辑的四点补正·····	李文杰(284)
对《张静江事迹片断》的订正·····	许炳堃(285)
“中央农业实验所”创立的经过·····	邹秉文(286)
对《万木草堂回忆》的质疑·····	李文杰(287)

开明旧事

——我所知道的开明书店

宋云彬

一 前 言

解放以前，全国有六家大书店，就是商务印书馆、中华书局、世界书局、大东书局、开明书店和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。^①解放以后，正中书局当然不存在了，世界、大东也相继停业，开明书店于1953年跟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。

讲到开明书店，它的资本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十万元，远比不上商务、中华。出版物的数量也不多。但是，由于它的服务对象明确，对出版物质量的重视，更由于在政治上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，始终坚持中间偏左的立场，所以它在当时被公认为是一家比

^① 这六家书店，其中五家是民营的，它们都出教科书，平时为了推销教科书，互相倾轧，互相排挤，竞争得很厉害。等到国民党官办的正中书局正式开张，它也出教科书，有官方做后盾，五家民营书店都怕它倚仗政治势力，在推销教科书方面，会不择手段地乱搞起来。世界书局经理陆高谊提出建议，自己内部先实行休战，团结起来，然后把正中也拉进来，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，合理解决分配销行教科书的问题。商务的王云五和中华的陆费伯鸿都赞成。由陆费伯鸿出面，邀商务、世界、大东、开明和正中的负责人，到南京汤山开了一个会。从此这六家书店形成一个集团。六大书店这个称号就是这样来的。这个集团的形成，起初原是五家民营书店借此来束缚官方的正中书局，但实际上却形成了书业托拉斯，从此这个集团以外的别家书店，就休想出版教科书。例如北新书局也是出了几种教科书的，只因陆费伯鸿他们不把它放在眼里，没有邀它参加这个集团，后来北新出版的教科书，销数就微不足道了。

较进步的书店，在六家大书店当中，一般人都把它跟商务、中华看作鼎足而三的。固然，讲到进步性，开明又远比不上生活书店，但生活书店的性质究竟跟开明有所不同，不必强拉在一起作比较。

商务创立于戊戌政变前后，中华创立于辛亥革命时期，而开明则创立于五四运动以后，各有它的历史背景。尤其是开明的产生，完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。没有五四运动就不会有人提出妇女问题来讨论，那么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，就不会因为谈新性道德和办《新女性》杂志而被商务印书馆解职，他将一辈子在商务当个编辑；而同时在五四以前，像开明这样的新型书店根本办不起来，即使办起来了，也不可能发展，更不可能长期存在。现在开明早已跟青年出版社合并，“开明书店”这块牌子不存在了，应该有人把它的历史记下来。我只能写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，不够全面，聊供参考而已。

二 从《编者附白》说起

鲁迅《集外集拾遗》中有一篇题目叫《编者附白》的短文：《莽原》所要讨论的，其实并不重在这一类问题。前面登那两篇文章的缘故，倒在无处可登，所以偏要给他登出。但因此又不得不登了相关的陈先生的信，作一个结束。这回两篇，是作者见了“《现代评论》的答复，而未见《莽原》的短信的时候所做的，从上海寄到北京，却又在陈先生的信已经发表之后了，但其实还是未结束前的话。因此，我要请章、周二先生原谅：我便于词句间换了几字，并且将《附白》除去了。大概二位看到短信之后，便不至于以为我太专断了罢。”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者又加了个注释：“本篇发表于1925年6月5日《莽原》周刊第七期章锡琛《与陈百年教授谈梦》和周建人《再答陈百年教授》两文之后。”

骤然读了这篇短文章，谁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一回事，更不会想到这跟后来开明书店的创立有关系。《鲁迅全集》编者所加的注释，也没有说明问题，现在我给它疏证一下。

五四运动以后，商务出版的几种期刊如《东方杂志》、《小说月

报》、《妇女杂志》等，都不能不革新内容，以迎合潮流。《妇女杂志》是由章锡琛主编的，特别在1925年1月出了一期《新性道德号》，载有章锡琛写的《新性道德是什么》和周建人写的《性道德的科学标准》。他们认为无论男子或女子，都不妨一个人同时跟两个人以上谈恋爱，只要“本人的意志如此而不损害他人时，决不发生道德问题”。这种议论，现在看起来，原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一些陈腔滥调。章锡琛先生也说：他们是从罗素的《社会改造原理》、《到自由之路》，加本特的《爱的成年》和爱理斯的《性的心理研究》等书里“烧直”来的。可是那时候的新旧卫道者们，却把这种议论看作洪水猛兽，群起而攻。首先是《晶报》，说他们教坏了青年，接着是《时事新报》的报屁股《青光》，说他们提倡男子多妻，女子多夫。《晶报》和《青光》的攻击，不起什么作用，因为《晶报》是一批“黑幕派”搞的充满低级趣味的小报，本来不被人重视，而报屁股上的文章也是无足重轻的。可是不久陈大齐也在《现代评论》（第十四期）上发表文章，题目叫《一夫多妻的新护符》，硬说他们提倡一夫多妻。陈在当时是个名教授，为胡适等所吹捧，又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过文章。他一站出来说话，影响就大了，使得章、周两位不得不写文章答复。可是文章寄给《现代评论》，《现代评论》却给它压起来不发表，写信去问也不答复，他们只好把文章抄寄给鲁迅先生主编的《莽原》，很快就登出来了。后来《现代评论》（第二十二期）也把章、周两位的文章发表了，不过是登在通讯栏里的，同时还登了陈大齐的复信。章锡琛又写了一篇《与陈教授谈梦》，周建人写了一篇《再答陈百年先生论一夫多妻》，在《莽原》第七期上发表。

这样一疏证，大家可以明白《编者附白》里讲的是怎么回事了。

三 《新女性》的刊行和章锡琛的被商务解职

那时候，商务的总编辑是王云五。王云五为了讨好《现代评论》派，1925年8月，把章锡琛调到国文部当编辑。从9月份起，

另由杜就田主编《妇女杂志》，《妇女杂志》就一变其原来面貌，专门谈些怎么样给孩子喂奶和怎么样做鸡蛋糕等等，因此销数一落千丈。锡琛的同事郑振铎、胡愈之等都为他抱不平，怂恿他另编一种月刊。经大家商定，取名《新女性》，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，由锡琛的朋友吴觉农出面当主编和发行人，发行地址就在上海宝山路三德里吴觉农的家里。王云五恼羞成怒，就在这年年底，送一封辞退信给锡琛，请他“另行高就”。

商务辞退职工，照例给一笔退俸金。锡琛服务十四年，有一二千元退俸金可以拿。振铎又介绍他在神州女子中学教几点钟课，他每月有了一定的收入，就拿这笔退俸金作本钱，用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，编印妇女问题研究会丛书，如《妇女问题十讲》、《新性道德讨论集》之类。振铎又把文学研究会的《文学周刊》和文学周刊社丛书交给他们刊行。书愈出愈多，销路也好，可是几千元的资本感到不足了，锡琛就向他的胞弟锡珊讨救兵。锡珊原在沈阳商务印书馆分馆当会计。他这个人勤俭朴素，积蓄了一点钱，又富于事业性。锡琛向他借钱，他感到自己依人篱下，不是久长之计，就决定辞了职同他老兄合办一家兄弟书店。他在回上海以前，荐了一位叫孙怡生的来管发行事务。1926年8月间，就在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十号挂起一块“开明书店”的牌子来了。

四 从兄弟书店到股份有限公司

那时候的开明，既然是一家兄弟书店，资本少，不过四五千元；工作人员也少，一共不过四五个人。除了章锡琛兄弟而外，担任编校等工作的有赵景深、钱君匋、王蕙史(女)和索非等。钱君匋是个美术家，每种书的封面都由他设计，因此开明出版的书有一种独特风格。后来别家书店也渐渐注意到封面设计，但开明确是开风气之先的。索非是个无政府主义者，思想不健康，但年轻力壮，干劲十足。他除了看稿、校稿，还要跑印刷厂，有时候还帮助做饭。开明的

业务发展很快,不到一年光景,六十号这一幢兼作住宅、宿舍、编辑所、发行所的房子,已经不够展布了,又租了隔壁六十四号的房子。编校方面也添了人,如王燕棠、汪曼之(女)和陈云裳(女)。(她后来改名陈英,解放后在科学院工作过)等。出书的方向也渐渐有所改变,关于妇女问题的书少出了,文学书和青少年读物增多了,还出版了几种属于数、理、化方面的中学教科书。此外丰子恺、钱君匋等搞的不少种歌谱,在靡靡之音普遍流行的当时,起了整风作用。而章锡琛设计的《活叶文选》受到学校教师和广大读者的欢迎(后面还要详细讲)。《新女性》杂志后来就停刊了。立达学会同人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方光焘、刘熏宇等编辑的定期刊物《一般》由开明出版。

1928年,由夏丏尊、刘叔琴、杜海生、丰子恺、胡仲持、吴仲盐等发起,改组为有限公司,资本五万元。1929年,公司正式成立。1930年增资五万元,1931年增资十万元,1933年增资五万元,1936年又增五万元,共计股本三十万元。经理先是杜海生,章锡琛自任协理。发行所先从宝山路搬到望平街,又从望平街搬到福州路,跟中华书局对面,俨然一家大书店了。

编译所也搬过几次场,先从宝山路搬到兆丰路,再从兆丰路搬到梧州路,租了一家丝厂的大厂房,前面做编译所、总办事处和货房,后面是美成印刷厂。^①编译所长是夏丏尊。主持编辑工作的有叶圣陶、王伯祥等。那时候,开明已经确定以出版中学教科书^②和中学生课外读物为主要方针(直到全国解放,这个方针始终

① 开明自己没有印刷厂。美成印刷厂是由章锡琛的小舅子吴仲盐发起的,也是股份有限公司,仲盐是大股东兼经理。这家印刷厂事实上就是开明的印刷厂,专门排开明的出版物,不接别家出版社的印件。只有一次是例外,那就是排瞿秋白同志的遗著《海上述林》,打成纸型,由鲁迅先生托人带到日本去印刷装订。鲁迅先生为了这桩事情,亲自到美成去过几次。抗日战争起来,美成全厂被毁,仲盐的家产也搞光了,回到乡里,郁郁不乐,就在抗战时期生肺病死了。

② 开明为了提高它在教科书竞销市场中的地位,于1932年出版过几种小学教科书,其中语文课本,叶圣陶写课文,丰子恺画插图,可称双绝。可惜小学教科书一向被商务、中华、世界垄断着,开明无法跟它们竞销,后来只好不印了。

保持，没有什么改变)。夏、叶两位先生在青年读者当中有极高的威信，他们自己编写的几种指导青年语文学习的书，给青年们的帮助很大。圣陶是个文学家，也是个很好的编辑工作者。他的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，给开明同人做出了好的榜样。

初期的开明书店，机构小，工作人员不多，都是一些趣味相投的朋友，没有什么规章制度，也没有严格的分工，完全是手工业作风，里面充满一种温暖的气氛，自然而然地提高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事业兴趣性，不斤斤计较工作时间和报酬。刚改组成为有限公司的时候，还保持着这种作风，但不久情况就改变了。大约从1933年起，开明开始拟订各种规章制度，陆续公布。这些规章制度，大部分是从商务那里抄来的，多数由丁晓先草拟，经会议通过。婢学夫人，学得个四不像。那时候总公司一共只有一百多个工作人员，组织系统却分为三个处所，一个室，十八个部，三十三个课和四个委员会。职工每天上下午签到，旷工照扣薪水。还有其他各种章则。这样一来，过去的那种温暖气氛，给一扫而光了。那时候，我已经进开明，我跟锡琛谈过，我说这样做有利也有弊，其弊在容易挫伤同事们的积极性。但锡琛他们的看法跟我不同，据说这样做完全合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云云。本来呢，为了严密内部组织，搞好分工合作，定一些规章制度，也是需要的。但必须结合实际情况，顾到开明的特点，考虑到如何保持那种优良传统，如何发扬同事们的工作积极性。然而锡琛他们全不考虑到这些，一味看商务、中华的样。锡琛也没有想到像叶圣陶为什么要从商务跑出来，做开明的编辑。当时开明的大多数同事，对锡琛他们这种搞法是有反感的。不久，圣陶就在他的故乡苏州盖了几间房子，全家搬了回去。他虽然没有脱离开明，但不是天天上班，一个月只来上海一两次了。

随着业务的开展，机构的扩大，各地分店的增设和人员的添加，也给开明带来了一些困难。首先是经济上的困难。大概也是一种规律吧，出书愈多，营业愈发展，愈加感到钱不够。开明没

有自己的印刷厂，不能用机器向银行押款。调度款子原是经理杜海生的责任，但后来杜海生辞职了，由章锡琛当了经理。锡琛原是搞编辑的，跟金融界不曾打过交道，因此又请了一位范洗人当协理。范虽然有办法调点款子，但是不多。所以当时开明表面虽然生意兴隆，内部却在天天过年卅夜。再加当时应付国民党反动派，更是一种棘手的事情。开明先后出版了好几十种中学教科书，这些教科书必须经当时的教育部审定，才得发行，那就不得不跟南京的官方虚与委蛇。开明出版的文学书，如茅盾、巴金和其他进步作家的创作，以及翻译的高尔基的作品等等，在国民党反动派看来，都是非常讨厌的，总要用种种方法来刁难。茅盾的《子夜》就受到过刁难，以致不得不在第二版作了一些删节。还有两种定期刊物，《中学生》和《新少年》，常常要受到所谓“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的刁难。因此，当经理的人又不能不跟上海的官方虚与委蛇。这些应付极不容易，自己必须有一条界线，突破了这条界线，那就无异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。我记得有两桩事情，开明应付得相当好。一桩是沈端先（即夏衍）译的高尔基的《母亲》被禁售，他们把“孙充瑞”改为“沈瑞先”，《母亲》改为《母》，仍然继续印行。一桩是郭老（郭沫若）的《离骚今译》，里面有“党人之偷乐”一句，审查老爷认为是暗骂国民党，不给通过。章锡琛就质问他们：“是不是战国时代已经有了国民党？”问得他们哑口无言，只好通过（但出版以后，他们还是在暗中查禁）。

而不久，抗日战争爆发了。

五 抗战时期和解放前后的开明书店

抗日战争爆发，开明总厂被毁，财产损失达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开明的两位主要负责人章锡琛和夏丏尊，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不关心时事。因为不关心，对时局就不能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

断。丐尊不相信会出现长期抗战的局面。他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：“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，没有认真跟帝国主义者打过一次仗，目前这个坏政府，更不会真正跟日本打起来。”（我觉得夏先生这句话只说对一半。他看透了蒋介石不会真正抗战，却没有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，全国人民同仇敌忾，坚决要求对日抗战，蒋介石为形势所迫，不敢公开降敌，就有打起来的可能。）锡琛呢，他虽然不是绝对不相信会打起来，但他把租界看作安全地带，以为梧州路是租界，即使打起来，也不会在租界中作战。他还有一种奇怪想法，认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关头，我这点小小事业算得什么。有一次我问他开明作了什么准备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回答我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章、夏两位警觉性高一点，看得远一点，事先作了相应的布置，开明的资产损失不会到百分之八十以上。

8月10日，南京的“教育部”召集上海各书店经理到南京去开会，宣布战争不可避免，要各家赶快把机器和各种重要物资搬离上海，说政府已经在武昌安排设厂地点，还拨定了运输船只，叫各人回去立刻动手搬。他们都信以为真。章锡琛第二天回到上海，就准备搬动。但那时候上海所有企业和居民都忙着搬场，运输车辆非常缺乏。开明自己没有一部汽车，靠临时雇大车搬货，一天搬不了多少，拆卸机器更加无法，只得听天由命了。可怜美成印刷厂的大股东吴仲盐，他的全部家产差不多全搁在这个厂里了，他哭丧着脸对我说：“机器搬不动，要搬也得花上万把块钱，美成没有这笔现款，只好听天由命。炮声一响，我准备坐在机器旁边，跟机器共生死！”

“八一三”炮火响了。开明响应国民党的号召，准备迁往武汉。国民党原来答应给他们准备好运输船只，可是等到要搬的时候又推说运兵忙，没有船只可拨，经过许多的争吵，总算弄到了两条船，分两批开走。第一批运的是纸型、书籍和纸张，先用民船从内河运到镇江，在镇江上英国轮船运汉口，总算安全到达。（押运这批纸型和书籍的是许志行同志，他在从上海到镇江的半途

奔牛地方，遭到敌机轰炸，差一点送了命。)第二批运的几部机器(向美华印书馆借的)，还有纸型、书稿、纸张、油墨等等，没开航，就被日军劫走了。章锡琛亲自到武汉去布置一切。那时候南京政府在武汉设有办事处，但什么都没有准备，要他们实践在南京时的诺言，毫无办法。锡琛天天到办事处去交涉，别家书店也派人在武汉，也天天去交涉，大家都气破肚子，不再相信蒋政府，认为武汉也一定要放弃。锡琛接到第二批货物被敌人劫走的消息，又接上海电报，说店屋因欠房租，房东已经起诉，要遭封闭，他就回上海了。从此他就住在上海，直到抗战结束。夏丏尊也一直住在上海。日军侵入租界后，他们曾经给敌人抓去关过十多天，靠内山完造(日本人，内山书店的老板)援救，才放了出来。

淞沪之战坚持了三个月，不久南京沦陷，南京政府搬到武汉，长期抗战的局面已经形成了。那时候，叶圣陶全家迁重庆，范洗人和章锡珊也到了重庆。我和同事傅彬然，战争一爆发就离开上海，各回自己的家乡。后来我和彬然都参加郭老领导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。武汉沦陷，我们都到了桂林。那时候，所谓“文化人”大部分聚集在重庆和桂林两地。上海的科学印刷厂也搬到了桂林，桂林的印刷条件比重庆好，我们向开明建议，先把《中学生》恢复起来，改名为《中学生战时半月刊》，叶圣陶主编，彬然和我做实际编辑工作，于1939年5月在桂林复刊。后来章锡珊、范洗人先后到了桂林，在桂林设开明总办事处，范洗人当总经理，重新组织董事会，我和彬然都被选为董事。但事实上我们早已脱离开明，我和彬然都参加了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工作，跟开明的关系只不过藕断丝连而已。1943年，彬然重回开明，离开桂林，到了重庆(开明编译所在重庆，由叶圣陶主持)。我仍留在桂林。下一年8月间，我狼狈地带了家眷从桂林逃到重庆，后来又回昆明待一个时期，1945年10月间又回重庆。1946年2月间，开明总处全部由重庆迁回上海，我因为跟开明已经毫无关系，没有回上海，到桂林转了一趟，又到武汉，再转香港。那时候桂林文化供

应社也迁香港，我还是给文化供应社做点工作。1949年2月间，圣陶和彬然都从上海来香港，我们同坐轮船到烟台，由烟台转北京，参加教科书编审委员会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前身）工作。上海是1949年5月间解放的，不久，开明的朋友们如范洗人、章锡琛兄弟和王伯祥等先后来到了北京。那时候，夏丏尊先生已于三年前去世，锡琛事实上也已经脱离开明。我对那时候的开明的情况，不甚了了，只记得1950年出版总署批准开明书店与国家合作，他们召开过一次干部会议，向出版总署作了报告。到1953年4月间，开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，改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，“开明书店”这块牌子就不存在了。

六 两本畅销书《爱的教育》和《开明英文读本》

开明书店有两本畅销书，一本是夏丏尊译的《爱的教育》，还有一本是林语堂编的《开明英文读本》。

《爱的教育》原著者意大利人爱米契斯(E. Amicis)，讲感情教育，也有点爱国思想(爱米契斯的教育思想是不健康的，这儿且不作批评)。夏先生从日文转译，陆续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，后来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，由商务作为版税书印行。夏先生在报上看到《爱的教育》出版的广告，兴致勃勃地跑到商务总发行所(门市部)去买，买不到。问为什么报上已见广告而书却买不到。店员傲慢地回答说：“我们这儿书可多哩，谁知道！”夏先生气极了，就要跟商务解除出版契约，又怕商务不答应，先要求把著作权出让，故意提高价格为二千元(约每千字二十元，这是当时所没有的高价)，商务当然不答应，商定到初版卖完为止，取消契约。他就把这本书交给开明出版。哪里想得到，这本在商务滞销的书，到了开明书店，竟会销数大增，各地小学校都采用作课外补助读物，十多年中，印了将近一百版吧，夏先生前后得到的版税，超过了他向商务要求的稿费十倍以上。所以虽然只是这么一本书，却跟开明

的业务发展大有关系。

普通一本书，无论销路怎么样好，总不及教科书，所以书店从来不肯让教科书的编者抽版税。但商务却有一个例外，周越然编的《模范英文读本》是抽版税的。周越然原想卖稿给商务，商务不肯出高价，允许他作为版税书出版。不料一出版，全国绝大部分中学校都采用，周越然陆续抽得几十万元版税，他就盖洋房，买古书，面团团作富家翁了。林语堂看了眼红，也想编一本来抢周越然的生意。他原是北大教授，跟鲁迅先生和孙伏园先生等都有往还。1927年，他在武汉政府外交部当秘书，武汉政府垮台以后，他准备在上海作寓公，不愿再当教授，也不愿干别的工作，想编一部中学英语课本，像周越然那样，靠抽版税起家。他就托伏园代向书店接洽。伏园当时最接近的书店，只有北新书局、开明书店两家。他先跟北新接洽，因为林语堂提出的条件是双方订立契约后，每月预支三百元，将来在版税当中分期扣还，北新当然不能答应。他又去向锡琛试探，以为会同样落空，不料锡琛居然一口答应了。那时候开明的资本不过四五千元，每月营业额至多也只有四五万元，答应每月支出三百元的预支稿费，不能不说是带有一点冒险性的。听说为了这件事，锡琛的老弟还跟他闹过一场呢。最近伏园跟我讲起这件事，他说当时林语堂对他说：“章先生既然答应了我的要求，我决定在上海住下来。”他就在静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，买家具，装电话，还买了一部汽车。这儿附带说明一下伏园跟开明的关系。伏园跟锡琛同学兼同乡，开明的创立，伏园帮了不少忙，最初挂在宝山里外面马路上的那块牌子，还是伏园写的字。

林语堂在着手编课本之先，每周在上海的英文《字林西报》上发表文章，批评现行的各家的英语课本，把它们批评得体无完肤。这是一种极巧妙的宣传方法。他又托锡琛请丰子恺给课本画插图，允许从自己版税中分出百分之二的数额给子恺。林语堂本以精通英文有名，他编的课本，确有他的特色，配上子恺画的插图，真

是耳目一新；而开明的出版物十分讲究装帧，前面已经讲过了。因此，林编《开明英文读本》一出版，中学校纷纷采用，不到几年，几乎把商务的周编《模范英文读本》给挤掉了。这个课本继续发行二十多年，林语堂得到的版税总在三十万元左右。这对于开明的发展，当然有很大的帮助。

锡琛按照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出版事业，确是有一手的。他气魄比较大，眼光比较远。有人对他说笑话：“听说从前夏粹芳初搞商务的时候，资本很少，后来张菊老（张元济）为戊戌政变受牵连，避在上海，跟夏相识，夏就每月送三百元给张菊老，请他主持编译事务。你的魄力和眼光，倒跟夏粹芳一样大，一样远！”这当然是说笑话，林语堂怎么可以跟张菊老相提并论！不过说锡琛跟夏粹芳一样有气魄，有眼光，那倒不能说是笑话。可笑那个林语堂，他得到许多版税，做了开明的大股东（我记得他投资一万元），到1936年，开明要增资，锡琛请他再认一点股，他对锡琛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近来特别对钞票感兴趣，我想积十万现钞，对投资这桩事情不感兴趣了。”

七 开明书店跟世界书局的争讼

林编《开明英文读本》几乎成了开明书店的命根。不料1930年，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，请林汉达同志编了一本《标准英语读本》。林语堂见了，认为《标准英语读本》的形式全跟《开明英文读本》相同，而且有不少课文是从《开明英文读本》搬去的（其实林语堂也不想一想，他自己编的课本，有不少文学故事，不也是从外国课本里搬来的吗），就要锡琛向世界办交涉。其实当时各家出版的教科书，原多东抄西撮而成，说不上谁抄袭谁，至于形式的类似，更不成问题，谈不上侵犯著作权。记得方光焘同志对我说过，林汉达编的课本也有它的特点，并不比林语堂的差。也许林语堂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他怕世界的英语课本一销开，会减少

他的版税收入，觉得非怂恿开明跟世界办交涉不可。那时候世界的编辑徐蔚南，跟开明夏、章两先生相当熟，他们就请徐转达沈知方，要求停止出版，实行改编。沈知方当然不买账。开明就请他们的法律顾问袁希濂律师写信给世界，提出严厉警告，认为《标准英语读本》侵犯他们的著作权，要求停止发行并赔偿损失。沈知方接到信，没有叫徐蔚南去跟开明接触，却把那封律师信交给林汉达，要他个人去负责解决。这是一个难题。汉达大学毕业不久，一个年轻小伙子，初出茅庐，毫无经验，要他直接去跟林语堂办交涉，怎么成呢？当时世界书局有个名义上的编辑所长范云六（实际主持编辑工作的是徐蔚南），是个老实人，他建议林汉达直接去找章锡琛谈，并且愿意写介绍信，因为他曾经跟锡琛在商务同过事。林汉达拿了介绍信去看章锡琛。锡琛见信中有“敝局出版之《标准英语读本》与贵店《开明英文读本》有雷同之处”的话，大为高兴，因为“雷同”一语给他抓住了话柄。他对林汉达表示，这封律师信本来出自林语堂的主张，只要林语堂愿意和解，他自己没有什么意见。就写了张条子，请汉达去看林语堂。汉达一连去了三次，头两次林语堂摆架子不见他，他只好留下一张名片，在名片后面写上几句话，大意说，来了两次见不到你，那个课本你认为哪几处应当修改，请告诉我，我愿意接受云云。^①林语堂立刻把那张名片送给章锡琛，他们商量决定，把信和名片制成照相制版，以“世界书局标准英语读本抄袭冒效开明英文读本之铁证”作标题，在上海各大报遍登广告。世界书局看到广告，就先下手为强，向租界法院对开明提起诽谤罪的刑事控诉，一面请律师驳复开明的广告。那时候上海司法界一片黑暗，南京的“司法部”掌握法官任免全权，部长王宠惠跟上海女律师郑毓秀有某种关系，凡

^① 第三次林语堂接见了林汉达，林汉达错把林语堂当作老前辈，向他虚心请教，说自己编教科书毫无经验，有什么不妥当地方，请他指正云云，不料那些虚心请教的话，也被林语堂拿来当作话柄。